

2006 年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 号：91040205135

華東師範大學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

院 系：人文学院中文系

专 业：文艺学

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指导教师：方克强教授

申 请 人：吴 芳

2006 年 9 月完成

Dissertation of Equal Degree Master Candidate, 2006

University Code : 10269

Register Number:91040205135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eminism under the male point of view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Literature Theory

Research Direction: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Instructor: Professor Fang keqiang

Applicant: Wu Fang

Completed in September , 2006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吴芳 日期： 2006.12.11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吴芳 导师签名： 陈伟
日期： 2006.12.11 日期： 2006.12.11

吴 芳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备注
杨文虎	教 授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席
吴 炫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田兆元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竺洪波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 峰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论文摘要

尽管女性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坛上依然存在这样的论调：女性主义是女性自己的事情，国内男性理论中心反应淡漠。本文通过论述，以期和这种论调进行商榷。本文从男性视角入手，重点探讨男性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全文共分四部分阐述，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男性学者、理论家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理论的积极译介和阐释，阐明男性学者、理论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情关注；第二部分梳理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话题的探讨和他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阐述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运用；第三部分从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入手，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两个方面，肯定性、否定性和双重性三个角度来评判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和认识；第四部分从两性的直接对话与间接对话入手，比较分析男女两性对女性主义理解的差异和一致性，阐明男女两性的对话、交流、沟通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不仅有男性批评家参与女性主义研究，而且有不少优秀的男性学者致力于女性主义的建设。不仅有男性学者热情参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同时有男性理论家的大量阐释，为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且有男性批评家积极参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男性学者、批评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文坛上存在着女性主义是女性自己的事，男性不关注女性主义的观点，造成这个盲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第二性”地位，导致女性形成了男性是不会关注女性主义的误解和偏见；其二，因为存在少数男性误解和抗拒女性主义的现象，女性则以偏概全地得出男性不关注女性主义的结论。只有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女性主义的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关键词：男性视角 女性主义 价值评判 两性对话

Abstract

Nowadays, though Feminism has been widely and booming researched, some views still hold that Feminism is the business of female, and it has little to do with male; This dissertation tends to argue against these views, and it starts with the male point of view, focusing on awareness and research from male on Feminism. This dissertation is categorized into 4 parts. The first part probes into the active tran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y male scholars for western Feminism Literature, hereby showing the enthusiastic attention from male critics to feminist criticism. The second part surveys the probes and critical practice at male critics on the aspect of Feminism, interpreting the approaches of male critics used for researched on Feminism.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judgements on the attitudes by male critics, starting with the value of Feminism which includes academic value, and spiritual one; and all these values are displayed in the terms of positiveness, negativeness and duality. The fourth part aims a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dialogu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ointing out the difference and conformity wit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due to gender, emphasiz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and beneficial for Feminism research to have dialogue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 key point for this paper is that there are many male critics participating in Feminist research, and many outstanding male scholars are kee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sm; there are many male critics warmly involved in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Feminism into East, and many scholars are devo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inism in China, it is a possibil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active critical practice of male critics, whose endeavour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feminism. Some views hold that feminism is the business of women's own, and men attach no importance to feminism, which are caused by 2 reasons. One is that women are all the way inferior to men, which brings mis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to women that men care little about feminism.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a few men misunderstand and resist to feminism, which is

concluded partially by women that men are not aware of feminism. Research for feminism could be going farther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Key words:

Male point of view; Feminism; Value evaluation; Dialogue between men and women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男性理论家对西方女性主义传播的贡献	(3)
第一节 男性学者的译介	(3)
第二节 男性理论家的阐释	(4)
第二章 男性批评家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7)
第一节 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话题的探讨	(8)
第二节 男性批评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12)
第三章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价值评判	(20)
第一节 肯定性的评判	(20)
第二节 否定性的评判	(23)
第三节 双重性的评判	(26)
第四章 两性对话中的女性主义	(29)
第一节 直接对话	(29)
第二节 间接对话	(30)
结语	(33)
注释	(34)
参考文献	(37)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

前言

“女性主义”(Feminism),也译为“女权主义”、“男女平权主义”,本文采纳国内大多数学者倾向的译法“女性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以来,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现状和未来。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些著名的西方男性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杰姆逊、乔纳森·卡勒、萨义德等都坦言自己的理论受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并且对女性主义都很关注。如伊格尔顿强调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政治的理论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是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基础。杰姆逊认为女性主义作为挑战西方“现代性”理论霸权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也是当下反思“后现代”思潮的理论资源。卡勒则将女性主义批评视为“近年来最有意义,基础最为广泛的批评运动之一”,在《论解构》一书导论中他指出“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¹。在西方甚至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学者如果不懂女性主义,几乎不能进行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播到中国,历经了从最初的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作品,到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文化文学进行评述和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文化文学中的性别问题的发展。二十多年来,女性主义跨越了中西方巨大的文化鸿沟迅速在中国拓展、深化。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正如火如荼。《读书》2005年第11期上刊登了钟雪萍的《后妇女解放与自我想像》,是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文中作者提出男性与女性主义关系的吊诡,是值得评论界引起重视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与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由此反推,知识分子的自我相像,与‘女性主义’似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女性主义的传播和其他西方理论思潮的传播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似乎理所当然的主要限于女学者之间,通过翻译介绍,通过‘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尝试着普及女性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理论机制,并探讨其对中国可能有的启发性。但是,也许因为女性学者往往不一定被自动接收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来自她们的介绍、反思和争论大都局限于‘女人’的范畴和女学者的圈子。”这些见解还是值得商榷的。

周乐诗在《跨越文化和性别的鸿沟》一文中也指出“国内男性中心的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的冷漠、不屑和由此发生的隔膜、无知”经常出现，“在性别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渠道尚未通敞的现实面前，无怪我们的女作家在一片众声喧哗中，要把自己关在房间的一隅，拉上窗帘，对着镜中的自我写作”。²类似的说法在当今文坛并不少见。

通过下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并非如钟雪萍、周乐诗等人所说的那样：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变成了‘女人’的事”，³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不被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基本处于边缘状态；国内的男性理论中心对女性主义反应冷漠。实际上，中国不仅有男性批评家参与女性主义研究，而且有不少优秀的男性学者致力于女性主义的建设。不仅有男性学者热情参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同时有男性理论家的大量阐释，为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且有男性批评家积极参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男性学者、批评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

第一章 男性理论家对西方女性主义传播的贡献

第一节 男性学者的译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到兴盛，与国内男性学者、理论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所做的积极的翻译、介绍和阐释工作是分不开的。由陶铁柱翻译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圣经”。书中波伏娃提出了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理论，对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树明等人翻译的英国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国内第一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各个流派的基本特征，汇集了1929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权威论述，包括文学和戏剧、电影、绘画等。

钟良明翻译的美国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 1934-）的《性的政治》，是美国第一部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该论著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指出两性关系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把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揭露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控制、支配的政治策略。

林建法等人翻译的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 1953-）的专著《性与文本的政治》中对伍尔夫至克里斯迪娃的女性主义批评发展轨迹的清理，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上的清醒和超越自身的能力。还有程锡麟等译的贝蒂·弗里丹著的《女性的奥秘》，吴国盛等译的卡洛琳·麦茜特著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革命》等等。同时大量的重要的西方女性主义论文也被男性学者翻译介绍。如第一部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性论文作完整而系统的译介，由女性批评家张京媛主编的批评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收入的论文中就有不少是男性学者翻译的。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各阶段的重要著作被男性学者不断地译介进来，并且势头不减。男性学者早期的译介多少带点随意性，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深入，他们更加自觉而且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他们的译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如陶铁柱对《第二性》的翻译，钟良明对《性的政治》的翻译等。甚至有的重要文本分别被几个学者翻译，有好几个版本，可见男性学者对这些文本的重视。另二类则侧重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集的译介，如林树明翻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从最初的零散、笼统的译介发展到后来的系统、规模化的译介，男性学者对女性主义的译介逐渐走向成熟。

虽然由于资料、版权和出版等方面的原因，可能有些译介不乏随意性或偶然性，同时也不排除由于不能够很好地把握原著精神，个别译介存在比较粗糙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男性学者的译介在总体上具有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的译介给国内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带来的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缺少女性主义赖以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女权运动这个背景，所以中国无法自己产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它的出现和发展首先必须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开始的。而男性学者的积极译介正好顺应了这个要求，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提供了可能。许多人正是从他们的译介入手开始接触并了解女性主义，同时他们的译介又是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基础。女性主义批评的引进和其他西方文论一起开拓了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动摇了传统理论系统的权威地位，直接推动了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女性主义的译介拓展了国内理论界的视野，为批评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女性主义的译介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男性学者对它译介的阵容和规模保证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一种良好的态势。

第二节 男性理论家的阐释

1、这一时期不仅有不少男性学者的译作，还有男性理论家对女性主义所做的大量理论阐释工作。王逢振在他主编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一书中热情介绍了美国男性理论家们对女性主义批评的高度赞扬态度，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男性理论家对女性主义的关注。

盛宁著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对美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梳理，并对米利特、肖沃尔特、斯帕克斯、莫尔、吉尔伯特、格巴和斯皮瓦克等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作品和思想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认为女权主义批评是有别于其他批评流派的一种批评，具备多种批评倾向和多元的批评方法。盛宁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运动出发，认为“女权主义”的翻译更为恰当。

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书中分别介绍了英美派、法国派和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

张首映在他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给予了女性主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女性主义“支撑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论批评的‘半边天’”，并且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也许是这个世纪唯一能延续几个、几十个世纪的文论批评流派”⁴。在这里他倾向于“女性主义”的译法。

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比较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英美派和法国派的差异，总结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流派的基本原则，并探讨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由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版在“女权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一章中从“从权利、性别到整体的人”、“身体书写的语言主体”、“创造力传统和阅读经验”三方面阐释了女权主义文论，并指出了女权主义文论所处的两难境地。

章国锋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介绍了波伏娃的《第二性》、美国杰西卡·本杰明的《妇女的欲望：心理分析中的女性主义和主体间的空间》、米利特的《性政治》、肖沃尔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其中阐明的女性主义观点。

以上这些文学批评论著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西方女性主义，一些文学基本理论论著也增加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如童庆炳主编的 2000 年版的全国自学考试教材《文学概论》，就在老教材的基础上加入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

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分析了西方女权主义经历了从最初的批判文学作品中男性的性别歧视，到妇女文学的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刘兵著的《驻守边缘》中的部分章节还重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

2、男性理论家有不少论著中都有不小的篇幅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对女性主义投注了很高的热情。另外还有一些收录了西方女性主义重要论文的著作。王逢振等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录了美国女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 1941-）的《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和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古芭（Susan Gubar, 1944-）的《“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

朱立元和李钧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收录了女性主义者阿特伍德的《女性肉体》和《女人的小说》、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主体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西克苏的《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克里斯迪娃的《爱情传奇》的第六章“隐喻之爱”的第二节“抒情诗人：从高尚的浪漫到寓言故事”和莫汉蒂的文章。

3、男性理论家、批评家不仅在论著中给予了女性主义很大的关注，还在不少论文中介绍和诠释女性主义。重要的有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林树明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抗拒的阅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王宁的《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等文。其中林树明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介绍了弗·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论，王逢振在《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中及时阐释了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

男性理论家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最新成果，给国内理论界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说明了国内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的重视。男性理论家对女性主义的阐释是在译介基础上的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从简单移植到自觉阐释，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经历了初期的捎带阶段到现在的自觉阶段。男性理论家的阐释使人们对女性主义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认识。他们的阐释大致包括这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对西方各个阶段的女性主义著述的阐释，特别关注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如阐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二是注重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如介绍注重社会批判的英美派和注重语言批评的法国派等，而且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几乎可以做到同步推介，如生态女性主义等。三是在介绍的基础上，注重评释。男性理论家在译介的同时对女性主义文论进行评述。他们不仅梳理和研究西方女性主义，还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意义、局限进行评介，并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反思。男性理论家的阐释展示了女性主义理论阶段性和系统性的基本形态。他们的阐释为女性主义在国内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前提，是使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国内批评界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的基础。因为男性理论家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女性主义的介绍从早期的带有情绪化的译介逐渐发展成后来的注重操作性的介绍，学界对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运用不断趋于理性化，女性主义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各个批评流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于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男性理论家的译介和阐释的有限性无法穷尽女性主义的所有内容，但这并不影响男性理论家的译介和阐释的权威性和经典性，同样也不影响国内学界对女性主义接受的经典性和代表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男性理论家对女性主义的译介和阐释同样存在着不足。包括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的关注而忽略理论自身的差异，和对西方学者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介绍等。

从以上两节的论述可以看出，男性学者、理论家对女性主义的译介和阐释是系统而全面的。男性学者、理论家分阶段引进介绍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最新成果，涉及了女性主义的各个领域：英美派和法国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唯物女性主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女性更多、更广。据粗略统计，男性学者、理论家参与译介的主要女性主义著作达二十八部，而女性的译介著述只有十七部。男性对女性主义的译介和阐释所作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章 男性批评家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不断大量系统化、专业化地译介和阐释的同时，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也不断发展起来。

女性主义批评的蓬勃发展与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新时期的女作家很多，一般按照年龄划分有年长的张洁、谌容、舒婷、戴厚英，中青年的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刘索拉、残雪、池莉、方方、蒋子丹、徐小斌、毕淑敏、张欣、斯妤、翟永明，还有更年轻的迟子健、陈染、林白、虹影、海男、徐坤等。她们的创作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之相应的女性文学批评也成为批评界的一大景观。这一时期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文章层出不穷，几乎所有的权威男性批评家都涉足过这个领域。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和女性主义理论译介的不断深化，直接推动和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其中不乏男性批评家的著作。孙绍先著的《女性主义文学》是国内学者最早的以“女性主义”命名的文学研究专著。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是一本全面而深入地介绍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实践的著作。还有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阎纯德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和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王吉鹏等编著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乐铄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林幸谦的《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和《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I》、禹建湘的《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周海波等著《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李有亮的《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等专著陆续面世。

林树明是国内从事女性主义批评时间较早、并一直潜心女性主义文论研究的男性学者之一，出版过相关译著、专著和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是一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论文集，书中比较早地提出了“性别诗学”这一理论，《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是第一部从跨学科多向度多层次地比较研究女性主义的力作。该著深入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过程，在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批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话语及生态主义等的互动关系中比较分析了西方女性主义，全面梳理并分析比较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国内像这种从跨文化角度、在多维视野中比较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著作并不多见。

同时大批男性批评家的女性主义批评论文也出现了，如孙绍先的《文学创作

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荒煤的《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孟繁华的《“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女性文学研究述评》、林树明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阎纯德的《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奇异景观》、易光的《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南帆的《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陶东风的《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李洁非的《“她们”的小说》、王侃的《“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陈骏涛的《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几个问题及三代女批评家描述》等等。

特别是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更加纷繁的女性写作新时代的到来，掀起了女性文学文化作品出版的高潮，其中男性批评家参与主编了比较有影响的几部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丛书。如《红罂粟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王蒙主编（规模最大、最齐全的丛书），共收入了二十二位女作家的小说，包括池莉、迟子建、叶文玲等的作品；《风头正健才女丛书》（北京华艺出版社），陈晓明、王朔主编，收集了王安忆、徐小斌、林白、张欣等七位女作家的作品；《红辣椒女性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陈骏涛主编，收入了方方、斯妤、张抗抗、蒋子丹、唐敏五位女作家的散文；《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作家出版社），孙郁等主编，是对东方及世界妇女的生存和文化状况进行透视的一部丛书；《她们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程志方、刘存沛主编，收有海南、陈染、林白、赵玫等十二位女作家的作品。男性批评家积极参与女性文学文化作品的主编，客观上支持并促进了女性写作和女性研究。

第一节 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话题的探讨

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和繁荣，学术界围绕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的论争，形成了几个热点话题。

1、界定“女性文学”的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理论话题。关于这个问题，自八十年代起，学术界就众说纷纭，没有权威的定义，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学界对于“女性文学”的解释一般有这四种：一种是指女性写的；一种是指写女性的，即不论男女作家，只要是反映女性命运的作品，都可视为女性文学；一种是女性写女性的，即女性作家写女性的生活、生命体验的作品；一种是用女性主义的立场写作的文学。就这个问题，男性学者、批评家持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孙绍先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是指那些以女性为创作重心的作品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问其作者性别如何，都视为‘女性主义文学’而‘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则专指女性作家的创作”⁵。所以孙绍先把茅盾的《蚀》归入“女性主义文学”的行列，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属于女性文学。孙绍先是最先提出“女

性主义文学”概念，并把“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文学”进行区分的学者，他首次将男性创作的女性形象也纳入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尽管他仅从题材上来界定女性主义文学，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尤为难得。

王干、费振钟认为不应单纯从性别意义上去理解“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而“应是风格学意义的概括”。⁶他们认同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文学风格的认定，显然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王侃则认为“‘女性文学’不仅仅意指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践，更重要在于‘女性文学’对摆脱男性中心语言，赋予女性本真经验以表述形式的目标追求。这一追求使得‘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文学行为，它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打破男性在这方面的垄断局面。二是挖掘超出男性理解惯性和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实现对男性世界的叛离，以构造出具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⁷。李有亮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补充了“女性经验、女性感受总是历时性地不断变化着的、女性话语、女性形式也是在与男性中心话语的不断剥离、不断对抗中逐步予以确立的”⁸的理解。王侃关于“女性文学”的解释注意到了女性文学应蕴含独立的女性意识的本质，体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相契合的特点。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区分林树明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从批评对象来说，“女性文学批评”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指对女作家、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读者的评论或研究；第二层指对包括了男性创作的一切女性形象及相关方面的评论或研究。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是一种伦理价值取向而非生理的区分，其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题旨十分明显。从批评主体看，男女两性都可从事“女性文学批评”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⁹

本文比较赞同林树明的观点，不单纯从性别和题材意义上去理解女性主义文学，而是从价值取向上去区分。而且林树明从批评对象和批评主体分别去分辨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文学也很有说服力。

2、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女性写作”的凸显，关于“个人化写作”（又称“私人化写作”、“私小说”等）概念界定的论题，进入了男性批评家的视野，他们积极参与讨论了这个话题。

尹昌龙等在《记忆与写作：我们时代的个人方式》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个人写作”的概念。作者认为私人经验“表明了一种个人方式的纯粹性”，“个人经验从主流历史中分延出来，产生了独立的品格”。在这里，作者把“个人写作”与“女性写作”联系起来，提到《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性经验问题，认为“林白从一个女性的经验出发，对个人记忆的书写更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在恢复个人写作的概念的同时，恢复女性写作的概念，而女性写作无疑又拓宽了个人写作

的空间”。¹⁰作者对于“女性经验”的关注，是值得一提的。但是文中仅仅把这种写作的意义理解为“强化了一种稗史写作的含义”，其实是一种男权立场的表现。他仍然沿用的是男性话语的权威和逻辑来解释女性写作，所以无法真正地理解“个人化写作”的意义。

陶东风在《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一文中对“私人化写作”作了界定。他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私人化写作的特点：“从写作的内容上说，私人化写作表达的是一种私人经验（意识与无意识），而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经验，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从写作的方式上说，目前的私人化写作大多采用了‘新回忆录’或‘新传记式’叙述。其特点是追随私人下意识流动而展开的‘琐碎式’叙述……从作者角色上说，私人化写作的作者是一个小写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写的‘我’（群体、人民或公众代言人）……从写作动机上说，私人化写作的驱动力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他认为陈染的长篇《私人生活》是私人化写作的最典型代表，并且肯定了私人化写作的积极意义，这种写作形式的出现是“社会文化更加多元、写作空间更加宽广的标志”。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写作存在的叙述的粗糙、叙述角度视点的单一等问题，所以他提出只有对私人经验的“提升”和“深化”，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¹¹陶东风对私人化写作具体而清晰的界定，表明了男性批评家在女性主义理论上的一种自觉。但是在如何提升私人化写作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男性批评家身上的一种传统男权思想的普遍困境。正是这种困境，无意中改变了男性批评家肯定私人化写作的初衷。

吴亮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一度处于争议中的“私人写作”，最主要的缺点“并非是与社会脱节，也不是所谓的自我暴露过度，而是——那些被仔细描述的私人生活缺乏令人一新耳目（更不要说令人震惊了）的殊异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某种由一般经验和一般回忆构成的‘类型’”，却不是一个“不可被替换的‘私人’”。¹²他在这里指出了私人写作真正存在的问题，并非太个人了，而是雷同和重复。

3、“身体叙事”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一个独特景观。对“躯体写作”的探讨，成为男性批评家频频涉及的话题。女性躯体叙事学的兴起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南帆用躯体修辞学论述女性主义创作时说：“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以往，文学的男性手腕，诞生于这些手腕之下的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为自己的欲望所设计出来的模特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同样是男性役使女性的意识形态。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¹³南帆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对躯体写作研

究最为细致的男性批评家。他指出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躯体语言来“冲破传统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并把这视为躯体写作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个主题的缘由，是颇有见地的。

而薛毅、禹建湘等人则对这种“躯体写作”表示出质疑和担忧。更有甚者，一些男性批评家竟以“准黄色”看待女性小说中的性描写。丁来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1995年12月20日）上的文章《女性文学及其他》就措辞激烈地责问《一个人的战争》为“准黄色小说”。就这个问题，女性批评家徐坤、徐小斌等紧随其后进行了辩驳和抨击。男性批评家李洁非也辨析和反驳了“准黄色”这一说。他认为“准黄色”这几个字包含了“莫名其妙”的心理，既明显表示了一种道德的谴责，又没有明确把握把那些描写归入“黄色”之列，所以只剩下某种“义愤”或“愤怒”。他在感慨这种批评的“荒诞”的同时，更看到了隐藏在这种“情绪失控的言词”背后的真实：“令男性中心话语感到恐慌”，而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写作想要达到的目的。¹⁴李洁非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他的反驳是准确而有力的。同时男女批评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几乎是异曲同工，不仅如此，他们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达成了共识。由此我们认为男女批评家完全可以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和建设的“共谋者”，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男性批评家还参与了中国究竟有没有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悖论等话题的探讨。陈晓明认为中国没有成气候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有西方理论家设想的那种女权主义文学”，¹⁵赵勇指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经不起理性追问的”。¹⁶而林树明则肯定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国内文坛“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群体意识的学术思潮”，并分析了它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¹⁷关于中国由于没有独立的女权运动，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女性主义批评的说法是一直存在的。不过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并非以女权运动为标志。尽管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但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确已经出场，而且已经由初创期进入了成熟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陈骏涛也有关于当前女性写作中的悖论的探讨。他认为当前女性写作存在着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内视角和外视角，自恋、自闭和自省、自强，双性对峙和双性和谐的五个悖论。¹⁸

还有吴义勤、王光东等在现实主义的命题下对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再认识，陈思和、张新颖对女性个人化写作边缘性的认定等。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被越来越多的男性批评家关注着。

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话题的探讨，成为他们研究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对“女性文学”、“个人化写作”、“躯体写作”的讨论，是中外女性主义批评家共同面临的理论难题。男性批评家的积极探讨，有利于对女性主义理论

的深入理解和运用。

男性批评家注重对概念的界定和讨论,是中国女性主义理论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他们在借用外来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获得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用新的解释进行研究,必然会产生新的理解和新的结论。从借用理论概念到改造理论概念并为我所用,是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是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接受和实践的过程。男性批评家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话题的深入探讨,使学界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认识更清晰、更深刻,同时为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使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男性批评家对理论的自觉追求,客观上驳斥了那些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理论性”的观点。中国的女性主义不但有自己的立足点,而且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继续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也许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缺乏体系,也许他们过多地陷于一些概念、术语地论争,也许他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还缺乏理论深度,但是他们自觉的理论追求,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话题的深入解读和阐释,推动了他们在理论指导基础上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引导着他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方向和内容。

第二节 男性批评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话题的深入探讨上,更多地体现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女性问题,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是男性批评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内容。

女性主义批评对妇女地位问题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荒煤指出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今天,女性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真正的人,也还有“异常艰辛的征途”。真正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获得是在女性真正得到了自由、平等、解放以后。¹⁹正因为有荒煤等一大批男性批评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女性问题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妇女的处境才不断改善。

孙绍先在《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中则对文学创作中的妇女地位问题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孙绍先是比较早的关注女性文学的一位学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反抗与控诉固然是对封建婚姻观念的猛烈冲击,但是一开始它在精神上就是不彻底的,仍然没有超出妇女人身依附的范围”;“近现代文学开始接触到妇女精神解放的课题,但进展不大……实际上还是没有超出妇女精神依附的范围”;“七九年以来,妇女问题的文学创作虽

然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没有实质上的突破……仍然没有跳出依附观念的束缚”。在这些梳理、论述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妇女题材的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寻找男人的文学”。最后他指出解决的办法“妇女也变为一棵树，和男人并肩组成生机勃勃的森林”。²⁰也就是说妇女应该追求人身到精神上的独立，打破传统的婚姻平衡观念，降低婚姻心理比重，彻底冲破精神上的依附感。孙绍先首先从女性自身去找原因，指出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是由女性自身的依附观念决定的。文中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女性评论家钱荫榆等纷纷著文与之争论。

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露其对女性的压抑，也是男性批评家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孙绍先在《女性主义文学》一书中，把男性创作的女性形象纳入了“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批判了父系文化圈中的性别歧视，分析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经历了“怨恨”、“报复”、“嘲弄”三个心理阶段，指出女性主义文学的困惑，并提出建立一种“双性人格”的女性主义文学。值得一提的是“父系文化圈中的性别歧视”一章，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批评倾向，揭露、抨击了男权社会塑造的“贞女”、“荡妇”妇女的两极形象。该著的“双性人格”是指“参照历史上典型的男性精神和女性精神而言，以往这两种截然分裂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有融合的趋势”，“男性和女性挣脱刻板性格模式的束缚，走向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精神世界，这符合今天文化向个体复归的大趋势”。²¹虽然该著的理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当时已十分难得。特别是论著中对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对后来的一些研究论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些当代男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依然是“美女人”或“恶女人”，表明了当代男作家仍受男权思想的束缚。他们希望女性形象按照他们的想象塑造，他们想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批评对这种现象坚决予以了抨击。

2、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无疑是男性批评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又一主要内容。他们注重对二十世纪女作家的研究，和对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的梳理。

男性批评家一方面注重对二十世纪女作家的研究，阎纯德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奇异景观》一文中描述了包括台湾、海外和香港在内的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概况，分阶段梳理了20世纪的女作家群。他赞成殷真把女作家分为闺秀派、新女性派、新闺秀派三种类型的观点，认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作家的创作具有了反传统的文化意识，甚至表现出女权主义倾向。秋瑾被誉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²²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则详细介绍了陈衡哲、庐隐、冰心、白朗等二十五位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

同时男性批评家注重对二十世纪女性创作轨迹的梳理，周海波等的《寻找失

去的天空》、李有亮的《给男人命名》两部专著都力求从“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进行了梳理。不同的是周海波把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分为三个阶段：闺阁女性文学阶段，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是少女时期；社会女性阶段，四十年代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无性化时代”为“拟少女时期”；女性话语阶段，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的少妇时代。

李有亮则从细处入手，以选择的年代(1919-1927)、追寻的年代(1928-1937)、怀疑的年代(1938-1948)、朝拜的年代(1949-1965)、“独尊”的年代(1966-1976)、困惑的年代(1977-1984)、引领的年代(1985-1989)、独白的年代(1990-1995)、迷乱的年代(1996-2000)这些细致的区分来划分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李有亮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女性文学中女性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男性价值的评说，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考察男性的世界。这一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以往较多地关注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艺术形象或男性作家如何写女性和男性的研究的补充。

男性批评家对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的梳理和研究，不仅从整体上展示了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的全貌，而且突出展现了女性文学各阶段的特点。

3、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男性批评家开始进行了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和评述。林树明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是国内最早的比较详细地梳理女性主义的引进译介情况，并对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研究和评述的论文。后来的一些论著论文在论及女性主义是如何从西方引进的大多以该文的材料为依据。文中他强调了“女性主义批评”不同于“女性批评”，是“对以往传统价值观的某种程度的颠覆和质疑”。他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1983年是萌生期，1988-1989年是勃兴期。²³在以后的论述中他还补充了对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评述，把1995年看作是再度繁荣期。²⁴在这些论述中他不仅研究了每个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容，还比较分析了后一个时期对前一个时期的拓展和深化的特点。

孟繁华在《“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女性文学研究述评》中对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从阶段上进行了梳理，特别是针对新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探讨。他从评论界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讨论、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的分析，肯定女性文学的功绩和批评女性文学的研究几个方面梳理了新时期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其中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研究是对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如关于女性文学是否只是寻找男人的文学，女性文学的“雄性化”，女性文学中的“自我宣泄”等问题的讨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存在的局限，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²⁵

4、对女性批评家进行研究和评判，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男性批评家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内容。

文坛上对女性文学和女作家的研究，可以说是热闹非凡，但对女批评家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特别是对女批评家的综合研究更是少见。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这种情况得以改变。陈骏涛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当代女批评家的男性批评家，也是第一位以代际划分来研究当代女批评家的男性批评家。他在《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几个问题及三代女批评家描述》中从当代批评史的角度，按照年龄梳理了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三代女批评家（包括女性学者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及其不同特点，并对她们的批评进行了评析。朱虹、盛英、刘思谦等第一代女批评家大多没有直接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不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基本走的是“社会—历史”的批评路子；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著述；以女性的视角和眼光，撰写了一批现当代女作家的研究评论著述和传记。以李小江、孟悦、戴锦华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批评家的研究使得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真正形成一门学科，并成为跨学科的文化领域；她们从“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视角来关照女性文学；表现出较激进的女性主义倾向；而且更为自觉、系统地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年轻的第三代女性批评家徐坤、万莲子、荒林等强调以文化立场来考察女性文学；以女性文学为主体向女性文化领域扩展研究；提倡性别对话，用一种双性（超性别）的眼光关照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译介的同时，更重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评述和诠释。

陈骏涛认为“第一代女批评家是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第二代中年女批评家是女性研究和批评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女批评家的潜力和前景更是不可忽视的。三代女批评家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并不影响她们的共识。“一个多元的批评研究格局”在女性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形成了。²⁶陈骏涛对三代女批评家的研究对同期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相关的论著、论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纷纷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基准进行论述。

易光则在《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中比较研究了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和王绯的批评。他认为她们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从非女权主义作品中挖掘出女权主义的题旨。戴锦华运用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而王绯更倾向于“女权主义”，所以她比戴锦华尖锐，显示出“片面的深刻”，是一种“女妖批评”。但不管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她俩在根本的文化或政治立场上，没有质的区别。²⁷这种比较批评也是非常难得的。

5、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深化，男性批评家把女性主义批评纳入了文学史的写作。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写文学史，使女性文学进入文学史的范畴。把性别视角引入文学史的写作，显然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 50 年》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部专著中都有专门研究当代文学中女性写作的内容，“女

性写作”进入了文学史的概念范畴。

在《共和国文学 50 年》“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一章中认为“共和国五十年的文学艺术领域中，恐怕没有比‘女性写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更能凸现出文学当中人性表达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更能显示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批评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到多元发展的变革。‘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了本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文艺领域中‘女性写作’已被列为一个专题纳入到专门的学科研究范畴。将文学写作进行性别上的甄别和划分，这在中国内地的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²⁸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在“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中阐述了“女性写作”：“……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女性写作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鸣的普遍意义，反之，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是以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的躯体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内容）。……这些创作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几乎都把男性世界和权力世界作为一个反抗的对象，作者们都努力确立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²⁹

男性批评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文学史的写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填补了空白。尽管女性主义批评刚刚开始进入文学史的写作，而且这种进入还是初步的，但它的革命性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一些男性学者、批评家从性别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中的性别和性问题进行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相关代表作有康正果著《风骚与艳情——中国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叶舒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和他主编的《性别诗学》等论著。

康正果在《风骚与艳情》中参照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透视和研究，其中的“女性研究”为古典诗词特殊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尝试。

叶舒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将人类学、考古学及文字学等融会贯通，通过对女神崇拜的讨论，正本清源，肯定女性的身体和力量，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参照。该论著受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为反抗和批判父权制度提供了依据。《性别诗学》由海内外一些关注性别批评和性文学的学者的专论组成，围绕四个专题，用性别视角分析性文学、语言文字和文学象征等等，该著体现了学界在性别诗学方面的研究特色。

男性批评家受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把性别视角引入了古典文化的研究,使女性主义批评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当然,伴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和兴盛,文坛上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一些男性批评家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疑虑和担忧,论争不断。

陈晓明在《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中指出女性一直“使用男性的语言写作”,她们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虽然80年代后期个人化的女性话语逐渐出现,但是中国没有女权主义文学,他用比较中性的“女性主义”来描绘女性写作。

面对女性写作的繁荣,陈晓明仍然很不乐观地认为,“这并不是说现在就迎来一个女性写作的黄金时代,女性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关切女性自身,关切女性的现实命运和文化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就女性作家仅有的“女性意识”,也主要是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自省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话语的副产品”。最后他对女性文学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预见,“强调女性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现实背景上展开女性主义叙事”,促使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放式的更有力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实践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当今中国的历史面目”。

陈晓明在这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女性文学繁荣外表下掩盖的其实是女性主义意识的淡薄,而那些初露端倪的“女性意识”,“不过是一次勉强的解放和随意的自觉”。³⁰

赵勇的《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一文从中国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女性作家的写作策略出发剖析了女性主义文学面临的尴尬境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中国女性面临着比西方女性更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国的妇女解放由正常的妇女解放路线“摆脱物化——获得人的尊严——还女性以本来面目”变成了“物——人——非女人(女性男性化)”这样的奇怪路线。女性走向了“新的异化之途”,女性意识继续被遮蔽着。九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女作家只是明确了自己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写作身份,但对写作动机和最终目的仍旧模糊不清。尽管这样,中国的女作家还是以女性主义的姿态进入了写作。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由于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所以她们表达的自身经验也不过是“男性话语的一种变体”。当然女性正在建构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通过身体写作来摧毁菲勒斯中心的语言体系,以自恋、私语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叙述话语产生了。但是不仅女性读者不认同她们的话语,男性读者也是出于猎奇的心理窥视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经验,而且这种窥视具有了合法性。在他看

来,这样的文本是不具备价值和意义的。所以赵勇在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喝彩声中表示了担忧。³¹

王侃则表达了这样的批评: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从西方女性主义性别差异的价值判断出发,抹煞了中国女性文学诱导因素的丰富性,使我们的批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怪圈。³²

这些是代表了女性主义偏离了中国的实际的想法,文坛上甚至出现了一种认为女性主义背离了人性的声音。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在《“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中的对话就是这样表达的。丁帆说,如果“女性写作完全进入一个女性‘性法西斯’的话语结构中,那它毋庸置疑地是对人性和人类情感的亵渎,同时也是对女性本身一种亵渎”。费振钟说,“女人要用她们‘性’的本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兽’,着与其说是强调了女性的自然力,不如说这是女性别无选择地逃离了人类文明”,是违反人性规则,反人性的。³³很显然,这些批评确实有些言过其实了,是不理解和误读女性主义的结果。

这样的论争看来还将继续,这种批评也是建立在真诚地推动女性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也正是女性主义批评向纵深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男性批评家已经可以完全熟练地运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们主要着眼于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和诠释,和对我国的文化进行评述以及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研究和评述。他们关注女性地位问题;重视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对女性批评家的评述,重点批判文学领域中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注重从性别视角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化。中国文坛上,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男性批评家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对我国文学文化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主义批评给我国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使学界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领域更为拓展。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的解构和颠覆精神的批评,成为今天国内理论批评界备受关注的批评模式。它和其他批评模式一起,形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的格局,颠覆了传统理论的权威地位。第二,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领域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为重新审视我国的文学传统开创了全新的角度。文学史方面,性别视角的引入必然改变长期以来文学史的男权中心面貌,女性文学的进入必然丰富整体文学史的内容。男性批评家在重写文学史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批评家比女性批评家更深一层涉足这个领域。男性批评家关注的是整体文学史的重写,而女性批评家关注更多的则是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文学批评方面,他们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重读文本,正在做着深刻的解构和批判工作。第三,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的浓烈的文化批判色彩,为

反思与重建我国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在批判传统的男权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女性文化，填补女性文化的空白，必然产生新的两性和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话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的活力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尽管男性批评家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存在着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运用比较生硬、还不够纯熟，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变化缺乏全面的梳理，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特殊性缺乏积极深入的探讨、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存在为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三章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价值评判

第一节 肯定性的评判

西方女性运动在历经了两次浪潮后，两性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女性权利的思想已被广泛接受，但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至今仍禁锢着女性，女性并未获得彻底的解放。尤其在中国，不曾产生过独立的女性运动，全中国的解放带来了妇女的解放，而不是妇女自身独立奋斗的结果。所以中国妇女面临的困境更胜一筹。当今中国女性尽管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利，取得了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的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或者说从根本上消除了两性差异。

在这个女性意识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女性中觉醒的国度，职业女性常常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家庭和事业孰轻孰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摆在职业女性面前，往往不可两全。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中心意识非常突出。绝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而不是什么女强人。他们既希望女人温柔贤淑，相夫教子能够装点门面；又受集体潜意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不希望女人太能干超过他们失了面子。总之男人不仅需要女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在家庭中还要以他们为中心，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当代职业女性的困惑。许多职业女性徘徊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不置可否。兼具贤妻良母和女强人两重身份实为不易，加上男人大多不希望她们在工作中投入太多的精力，他们希望遵循的是“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模式。而另一些事业有成或高学历的女性却往往被男性冷落，婚姻生活不尽人意。职业女性所处的尴尬境地有目共睹。

可是更多的女性意识被遮蔽的中国女性却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附庸，并以遵守中国传统美德自居。作为弱势群体，她们不仅没有积极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意识，反而认为女人本来就是弱者，天生就比男人低一等，男尊女卑这个几千年恒定不变的“真理”，没有必要质疑和反抗。所以男人打女人是正常的，女人成为生育的工具也是正常的。她们（包括一些知识女性）甚至觉得家庭暴力和沦为生育机器等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女人在这些事情上做文章简直就是小题大做。在她们眼中“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不是神话而是事实。日常生活中，她们依然扮演着“花瓶”的角色，各式各样的“商品+美女”式广告充斥着大众传媒，商家和媒体极力打造大众情人式的美女形象，吸引观众的眼球。男性为女性设定的形象依然是可供观赏的、赏心悦目的，而这种乐意被观赏的意识也依然牢牢地束缚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

甚至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宁可放弃求职求学的机会，甘当“金丝鸟”、

“笼中雀”。也许可以这样打一个比方，中国女性非常不易地摆脱了裹小脚的桎梏，却又自觉地套上了高跟鞋的枷锁。这些已经具备了在社会上与男性平等竞争能力的女性，如此轻易放弃了她们早已获得的权利，是和她们缺乏女性的自觉意识分不开的。这些知识女性不仅没有把知识作为自立自强的力量，反而变本加厉地把知识变成了找依赖当附庸的筹码。可以这么说，这些女性比起前面提到的传统女性更可悲，女性的自我奴化现象更为严重。

实在难以想象，当今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仍如此匮乏。由此看来，中国女性的解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仅靠外部力量就能完成的，必须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如果单纯地依靠时代社会的力量去解放女性，而女性自身却毫无女性意识的自觉，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解放。只有做到由外而内的真正的觉醒，中国女性的解放才能彻底。正如荒煤指出的“妇女的真正的自由，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不是哪些人在理论上提出若干条文、标准、要求就可以解决的。这有待于现实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新的观念逐渐形成，妇女在社会中的确有了真正的独立、自主、自由之后才能解决”。³⁴

伴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复苏和觉醒，引发了女性文学的兴起，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要的在于“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那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的实践。

几千年来，女性处于文化的边缘没有历史，她能够书写的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所以“女性的真理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³⁵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为被强大男性话语掩盖的、歪曲的女作家正名；揭示女性形象的本质即男性文化中的“空洞能指”；质疑传统的批评方法和价值观念，建构平等、合理的价值体系。男性批评家在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阎纯德等重视发掘曾经被冷落被忽视的女性作家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中恢复了现代文学史评价不高的一些女作家以本来面目，苏雪林、凌叔华等。林幸谦等则从被埋没的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生发出鲜明的女性主义题旨，如《荒野中的女体》。周海波等关注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寻找失去的天空》就是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论著。陈思和等重写文学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把女性主义批评写入文学史。王光明等由原来从事文学批评转向了对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视，如他的《女性文学：告别1995》³⁶等。

在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中对男性文本的反传统解读中，我们发现“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放妇女问题困难得多”！难怪王蒙在读了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后会“大吃一惊”，认为“刘慧英的书稿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³⁷

李洁非的《“她们”的小说》质疑了男性批评家认可的传统批评方法和价值体系。文中他例举了有的男性批评家以“正统”自居，视女性主义作家采用的叙事话语为“非法”，有的甚至不能接受“个人化叙述”，他们认为只有包容了人类的、社会的悲欢的文学才是具有价值的。李洁非建议女性主义作家不仅不要放弃“自我注解”的努力，而且应该从建设女性主义叙事诗学的高度上，完成女性主义创作自己的言语形态。

同时他针对有的男性批评家把小说情节等同于女性作家本人的实际生活（“自传体”），有的一叶障目地认为女性主义写作混乱不堪等等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驳：“居然有男性批评家会振振有辞地拿这一点去攻击女性主义小说，实属荒唐之举”，“只会暴露他们自己艺术上的盲视”。他认为女性主义采取的是“以血为墨”的勇敢方式，“女性主义写作是一个小说叙事学上的统一体”。李洁非在总体肯定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抨击了男性批评家的种种偏见、误解和曲解，确实难能可贵。

李洁非等人还本着尊重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立场，指出了现阶段女性主义写作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有的女性主义写作不是以反抗男性话语为手段，而是以之为目的，因此容易产生新的独断论。男性只能赞美女作家的作品，如果批评了女性主义作品，它的言论就具有男权意味。这些都有使女性主义作品走向偏执的可能。有的女性主义作家否定人类普遍价值和艺术美感的存在，把男性艺术家创造的作品等同于“男权”的代码和产物。所以女性主义也应培育“多元共存”的观念。³⁸

他们都是在总体肯定女性主义写作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积极因素上，对它的某些方面持有保留态度。这些批评都是非常真诚和有益的，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立足女性文学文本实践，对文学史中女性“空白之页”的发现与改写，追溯女性文学传统，

建立女性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清理与批判，重新解读男性文本中歪曲的女性形象，揭露男性“大师”对文本造成的“暴力”现象；倡导女性的写作方式，重构批评方法和价值体系等几个方面所做的努力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就像范伯群在读完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后说“我认为李玲所提的问题是有深度的。我的脑子里的关于性别意识的‘黑箱’确从来没有打开过，经她这么一提，我就要去考虑自己有没有陷入‘集体无意识’之中，甚至参加了‘无主名的杀人团’，吃了女性的几片肉。我没有资格说‘救救女人’，我只有资格说，‘救救自己’！”。³⁹

“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平权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⁴⁰尽管女性的地位处于“第二性”，但可以看到经过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懈努力，女性的文化边缘状况开始改变，女性自身被历史湮没的处境逐渐变化，女性终将“浮出历史地表”。

第二节 否定性的评判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和深入，关于女性主义的批评和论争也不断增多。由于女性主义很容易被男性误解为一种反男性的思想进入文化批判领域，导致他们本能的抗拒和不理解，曲解和误读女性主义的现象时有发生。

1、一些男性批评家认为中国妇女已获得彻底解放，其解放程度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陈晓明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像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⁴¹他如是说的依据是七十年代初，西方一位极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来到中国，发现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在当时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超过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里暂且不去考证这个极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姓氏名谁，只是陈晓明援用她对中国妇女的很不全面的认识来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并不恰当。事实上，在中国，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女性在追寻解放的道路上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今天，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并非像那位西方女权主义者想象得那样乐观，更不用说什么思想禁锢的七十年代初了。

如今，中国社会男尊女卑意识仍然非常严重，女性仍然时时处处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的压抑和束缚。尽管女性的许多权利已经受到法律条文的保护，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生育选择男女比例失调、遗弃女婴、女童失学、女大学生找工作难、男女不同酬仍很普遍，买卖婚姻、女性作为性交易的商品现象有蔓延的趋势等等说明中国女性的真正解放并非是单纯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就可以

完成的。更不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贬抑男性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过对男性经济地位的贬抑而达到男女平等”。⁴²如此看待中国的妇女解放，其荒谬之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所以男性的经济地位受到了贬抑，男性的经济优越感丧失了，所以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全面瓦解，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自以为是了，而逐渐谦恭驯服起来。妇女则变成了统治和管理男性的同谋。当然解放的妇女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男子汉了。不用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权中心主义者。男性天生就是统治者，本该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妇女解放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了，男性连最起码的经济优越地位丧失了，自然也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相当可笑的论断，不用说直到今日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很普遍，就连男女平等最基本的条件同工同酬都无法接受，如此夸张的男权中心主义不用辩驳，个中的荒谬之处就不言自明了。

这样的论调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发生“七十年代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是因为美国妇女回归家庭引起的，矛头所向是男性社会对于妇女的歧视，而此一阶段中国正值社会主义时期，女性早已走出家庭，与男人同工同酬，而此时的社会意识是男女平等。连一贯将女性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西方女性主义者来到中国后，都吃惊于中国女性解放的成就，并认为在这方面西方人没有资格自居导师”。⁴³中国女性解放的进程历经将近整整一个世纪，有学者在论及时仍无视中国女性的现状，女性已经获得根本解放的天真论调仍不时响起，不知是对女性解放心存不满，还是可怜的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无怪乎中国女性解放的步履如此艰难。

2、另一些男性批评家认为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偏离了文学批评规范。王侃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多次撰文表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性别/政治的双重设置是女性主义最重要的批评策略。现代女性文学由两种既分立又“互文”的书写构成：一是“政治文本”，即以丁玲为代表的对反抗民族与阶级压迫的文学书写，一是“性别文本”，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对这种双文本现象给予“双重关注”，才是正确的批评视野。他认为如丁玲的女作家书写“政治文本”并不是一种生存或技术性的“修辞”策略，而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批判策略。她进入“政治文本”书写，其实是“对女性意识更为宽泛也更为完整的领域的进入”。所以学术上对丁玲的贬抑，认为“女性主义批判锋芒消失”（周海波的《寻找失去的天空》、李有亮的《给男人命名》中都持此种观点）存在偏颇之处，是非女性主义或狭隘女性主义的。⁴⁴

他还认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将“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分离，片面地放逐了“政治文本”，这些批评研究一方面对性别文本在历史上总是被权力话

语拆除或改写的命运进行了批判,使性别文本恢复了合法面目;另一方面,却以矫枉过正的‘报复’手段将政治文本逐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使政治文本遭到前所未有的话语暴力的“清洗”,呈现出价值评判的紊乱。⁴⁵

其实这种将“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分割开来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表现。“性别文本”就是“政治文本”,是一种“性别政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文本’和‘性别文本’不仅不能概括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丰富复杂的内容,其划分方式还暗含男性批评对于女性写作的强权,企图以‘政治文本’高一等的姿态引导‘性别文本’,企图把女性写作的批评尺度社会问题化、社会尺度化,在此男性批评体制化语言‘高屋建瓴’的概括,恰恰是一厢情愿对女性写作及批评多样性的取消”。⁴⁶

王彬彬认为以女性地位确立批评准则“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真正价值和常规价值”,⁴⁷为什么说以女性地位确立的批评准则就是不规范的,反之以男性为标准确立的尺度就体现了文艺批评的真正价值。究其原因也是男性中心意识的影响。

这些男性批评家的认识都是按照常规的审美价值尺度来衡量女性文学造成的偏见和歧视。他们认为的规范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是男性审美价值尺度。这种“常规”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也是女性主义解构的对象。常规或规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影响和控制话语运作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因此话语本身也烙上了深深的性别歧视的印记。在文学创作中女性没有话语权,女性只是被安排进入男性的话语系统。女性话语通常被认为是反逻辑的,与男性所谓的话语规范是对立的。同时话语建构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以他们的尺度来评判女性写作,是不合理的。

3、还有一些男性批评家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本身就存在问题。丁帆觉得并不是女性写作的“媚俗”,而是女权主义文化本身的“媚俗”。“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文学艺术就其特征而言,无法回避文化上的媚俗,就是‘裸露癖’、‘窥阴癖’的表现”。⁴⁸

完全有理由认为,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认识女性主义,完全是出于他们对女性主义的抗拒和不理解,导致这样的偏见和误读。如果这些女性的隐秘经验由男性作家来表现,也许就不会被认为是“媚俗”了,很有可能被认定是“艺术”。一直以来文学史研究对女性创作评价不高,文学史上由男性作家代言女性经验也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了。而男性和女性谁更适合表现女性经验,谁能更准确地描写女性经验,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由女性自己写自己的经验,取得这个领域的发言权,可以看成是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男性在潜意识里始终是不愿女性对自己身体表露兴趣的。尽管他们在作品里可以有大胆的性的描写,但这种“大胆”是不能显现于女作家笔下的。

她们对自己独特体验的描写必须浅尝辄止，“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是比较好的表现方式。女性连展示她们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权利都没有，谈何自由？这种语言的禁忌也是男性压制女性的方式。所以女性主义作家勇敢地进行了反抗男性的压迫，冲破男性话语的封锁的尝试，坚决地采取了挑战性的话语方式——性的描写，她们“大胆地冲破父权制禁忌”，“对菲勒斯话语进行的令人振奋的挑战”。而男性因为无法把握女性呈现生存细节的这种方式，只有巧妙地利用了话语的权威把关注的焦点引向了所谓的“裸露”、“窥阴”。

4、甚至男性批评家之间对女性写作的看法自相矛盾。大部分男性批评家认为男人不希望女作家写政治、社会、历史，他们不希望女性创作出对社会对历史有影响的作品。⁴⁹重大题材或中心题材的写作一般是男性写作，而女性则被限定在私人空间里。也有部分男性批评家难以接受女性个人化写作，认为女性主义首先必须谈论一些男性不希望她们谈论的“宏大”话题，必须从对自我身体的关注中解脱出来。⁵⁰究竟女性写作是应该更深入地潜入内心世界，还是更广阔地直面社会人生，或者是两者都不可偏废，这是连男性批评家之间都没能达成共识的命题，更不用说他们的批评令女作家无所适从了。

那种不希望女作家写社会、写历史，最好退回私人领域的建议，完全是男性话语的霸权，把女性置于被看的境地。而另一种认为女性文学狭隘、囿于女性狭窄天地的看法，显然是根据“题材决定论”的偏狭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的。其实“最能代表她们的创作成就与特点的却是那些与男作家不同的，被社会的文学观念批评为狭隘偏激的作品”。⁵¹由此可见，题材问题上的性别歧视同样存在。

第三节 双重性的评判

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创作异彩纷呈，女性主义话语不仅在研究领域，而且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和时尚杂志中。面对女性写作的繁荣，大多数男性批评家采取了积极首肯和认可的态度，这的确是令女作家、女学者感到欣慰的。但是这种自觉支持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某种不自觉的“他们”看“我们”的陷阱呢？尽管这些男性批评家从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出发，在理性上是赞同和肯定女性主义的，但是他的性别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意识，他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父权制的牢笼。男性的肯定意见有可能致女性写作于歧途，商业炒作和男权文化很可能形成某种合谋，女作家也可能在不自觉中加入这种合谋，使女性重新陷入“被看”的境地。也许这种误导是无意识的，这种“共谋”也是不经意的，但是它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尽管男性参与主编了不少女性文学文化丛书，参与研究了许多女作家作品，但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运用，把女性置于“被看”的位

置上，女性成为男性的“看客”。“女人天生是被看的嘛，她们本来好看嘛。于是女性文学繁荣的背后，有一种男性的运用。”⁵²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陈顺馨、徐坤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陈惠芬针对女性丛书热，发出了“是谁在編集？谁在出版？谁在指导和谁在观看”的疑问，并指出 95 世妇会在我国的召开，“无意间为女性的再度‘浮现’和商品化的操作提供了契机”，女性对于自我的“‘突破’恰是通过市场的意愿抑或男性文化的另一种指认”。⁵³可以这么说，不管女性是主动地“说话”，还是被动地“被看”，都逃脱不了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女性文化热的背后也许意味着女性主体的再度失落，“突围”的女性写作有可能再次“陷落”。这正是女性主义无法逃脱的宿命。所以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男性的积极肯定时，应该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

也许男性批评家在学术研究中可以引入性别视角，但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性别意识的“黑箱”很可能从来没打开，或很少打开。也许男性批评家在意识上是积极的女性主义者，但又很有可能陷入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中。尽管许多男性批评家一直积极地为女性写作呼吁，但这种呼吁实质上仍旧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对处于边缘的女性所作的发言，这也是男性面对女性主义时的悖论。

应该不排除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男性批评家在学术上是女性主义者，积极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或极力为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但在生活中扮演的却仍是男权主义者的角色。他们的思想里，仍然不同程度地认同着重男轻女或男性优于女性的意识。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终究无法摆脱传统的性别观念的束缚。学术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传统势力相抗衡，而传统的改变也绝非一日之功，必定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外的不同表现以及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同样是男性无法摆脱的宿命。

还有一些男性批评家从女性主义小说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自我经验的个体言说，摆脱了当代小说“集体言说”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多样性这一角度去肯定女性写作积极的探索意义，同时从“女性写作无法把女性的命运和历史性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女性的诉求过于个人化和内心化”，个人化写作存在表面化、欲望化的问题，“缺乏深沉的思想和深邃的人性内容”等方面分析了女性写作的缺陷和不足。⁵⁴其实他们所评价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是同一层面的内容。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居高临下地用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女性写作，不自觉地以男性视角去期待女性写作。而女性写作恰恰是反抗传统的文学规范、颠覆权威的男性话语，超越了以往男性的价值立场、不符合男性的阅读期待的写作，一时很难被男性所理解和接受。男性在批判女性写作“过于个人化”、“缺乏深邃的思想”的时候，是和女性写作潜入内心的个体经验和生命体验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离经叛道的描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非议。他们无法

宽容这种原本由他们掌握而如今被女性抢占了话语权的写作，或者是他们的男性视域无法涉猎而由女性独享了话语权的写作。然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写作，开启了当代小说的新局面。在男性批评家的爱恨交织中，女性写作正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

第四章 两性对话中的女性主义

第一节 直接对话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不光是女性关注的焦点,男性也对女性主义投注了极大的热情。随着一批男性有心者和有志者的参与,逐步形成了一种讨论和对话的氛围。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两性之间的对话。女性主义在两性的对话、交流、论争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文坛上众所周知的那场王干与戴锦华关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的对话,其实不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对话。王干在通篇对话中毫不讳言他的男权视点、立场。他用“巫”这个称谓把新时期的女作家分成三个层次:老三巫、中三巫和新三巫,并且认为“女性本身就处于这样一种被看的境界”。戴锦华不仅对王干的“货真价实”的男权观点予以了坚决的反诘,而且清楚地界定了“个人化”写作,她从三个层面进行了阐释:“一个是个性风格,比如鲁迅是一个在风格意义上相当个人化的作家。另一个层面,所谓个人化,是指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去切入历史。据我的理解,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最后一个层面,其实也是这个对话潜在的主题,是针对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⁵⁵戴锦华对“个人化写作”的阐释可以视为众多阐释中最清晰、最合理的一个。

陶东风与林白的对话《私人化写作与女性作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场对话。该对话就“私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与性别”、“如何提升私人化写作”三个层面展开。陶东风以一个男性话语代言人的身份向林白提出“你是否承认,你的写作属于私人化写作?”“我觉得私人性写作多数见于女作家。我的问题是:私人性写作与性别有没有关系?”“你在你的小说尤其是《一个人的战争》里,力图把私人经验作为一种审视对象……第四章的叙述显得匆促、急躁,试点变化不多。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等问题,而留给林白的只剩下“是”或“否”、“有”或“没有”的回答空间。⁵⁶在分析《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小说》时,他也将这些文本置于男性话语的视阈之下来进行理论解读。

在荒林与王光明的《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中,对新时期的女性创作进行了比较清晰地梳理,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女性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戴厚英的《人啊,人》到张洁的《方舟》,最初随着人

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从表达一种社会理想,对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渴望,到以两性关系为重心,反对妇女在历史中被书写的处境及现实中丧失话语权的遭遇;第二阶段以残雪、王安忆的小说为代表,一反男性写作的线性历史时间,深入梦幻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女性话语意识有所加强;第三阶段是90年代真正的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这时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集体生存体验的自觉,许多女作家寻找到了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如林白、陈染等人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更自由、开放和清明。

该对话特别针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九十年代的女作家都拥有自己的女性立场,女性意识得以确立。但是王光明从男性的角度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提供的一些新的东西持保留态度,因为“她们把文学引向了微观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与男性来说是盲区,所以不容易被接受。对话最后指出如何抵达并表达存在的深度,写出大气度的女性文学仍是女性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⁵⁷

铁凝、王尧关于《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的对话也是不容忽视的。对话中铁凝重申了自己对女性主义话题淡漠的立场,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从人出发的,作家应该有超越性别身份的意识,并且强调要警惕性别的纯粹视角,警惕过分地自赏和自恋。并且指出小事也可以写出大气象,没有必要纠缠到底写大事还是小事。王尧认为男性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男权话语的牺牲品,而男性缺少这种自省,总认为自己是思想者。⁵⁸

荒林、王光明的《两性对话》是第一部由男女两性作者合作,从性别角度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女性处境、两性关系演变的对话体著作。该著作广泛涉猎了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现实状况,深入探讨了“女性与现代性”、“城市中的女性”、“乡村中的女性”、“平等社会与男女不平等现实图景”等中国社会敏感而重要的话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强调说,他们的“对话试图贯彻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二合一的标准”,这一标准“能为探讨如何在文学中建立更合理的两性关系,塑造更美好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提供相对合理的策略”,⁵⁹明确、公开地强调或者说坚持性别立场、性别视角。

这样的直接对话,是进一步研究女性主义很好的方式和途径。有的话题在争论中达成了共识,也有的话题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

第二节 间接对话

其实两性之间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对话、沟通、争论,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1、对女性文学的界定一直众说纷纭，前面谈到王侃、林树明等对女性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戴锦华则“并不赞同急于去规范、界定女性文学的内涵、范畴、特征，或申明它的定义”，因为这样“可能会再次框死女性文学所展示的巨大可能性”。她希望用女性写作或女性书写取代女性文学的概念，强调写作者的性别身份和女性写作的颠覆与反抗性。⁶⁰这样的争论应和了西苏的“要给女性的写作实践下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因为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将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它正在而且将还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它将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思，由任何权威都无法制服的边缘人物来构思”。⁶¹正是这种不可定义性，从内容和形式上给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2、就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理论的具体化表述，徐小斌说女作家的写作是“以血代墨”的写作，荒林认为女性写作是“一场以身体和生命对书写符号的突围”，徐坤则给予女性躯体写作很高的评价，“文学史上女性的躯体返回到女性主义诗学本身，不再完全受控和受制于男性叙事主体。这必将带来不光是审美的，同时亦是整个文化上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⁶²男性批评家南帆同样认为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躯体写作“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李洁非指出躯体写作是女性主义的叙事符号和挑战男权的语言修辞方式。

当然一些批评家完全不赞同这些看法，甚至否定女性主义的躯体写作。崔卫平在《我是女性，但不主义》一文中，彻底反思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质疑了“躯体写作”等术语。“用躯体写作，这听上去非常诱人，但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理论对女性具有更大的讽刺性。这与其说是诱惑、挑战，不如说是重新讲述一遍由男性社会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那个神话，……当今某些女性作者笔下的那些性描写、肉体描写实际上是受者某种鼓励、是被期待的，以前那种被禁锢的力量在眼下已经微乎其微，不管是从男性的眼光还是从商业的立场上看，女人写自己的身体已经成了一桩天经地义被允许的事。在一个文学标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在一个文学素质普遍低下的环境里，事实上还存在一个隐藏的色情市场。这对于当今从事女性写作的人来说——如果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恐怕是一个不能不加以考虑和警惕的一个陷阱”。⁶³崔卫平也许是对女性主义“清算”最激烈的一位女性批评家。

批评家在对待躯体写作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但是讨论者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阐述自己的意见的。有的是想阐述女性写作的革命性意义，有的是想指出它的局限性，其实没有必要形成一种根本对立的态势。不过这种不同认识的争鸣对女性主义批评向纵深的发展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3、对待个人化写作的态度上，陶东风在肯定私人化写作的积极意义的同时，看到了这种写作的叙述粗糙、叙述角度视点单一等问题，提出只有对私人经验的“提升”和“深化”，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任一鸣也认为个人化写作一方面具有挑战主流文化形态，反叛男性中心文化的独特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以个人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写作，缺乏向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提升，不可能产生女性主义的抗鼎之作。所以女性主义文学可以与现实、历史对话，“更应关注已属于女性文学的历史记忆和时代精神”。⁶⁴ 这两位男女批评家同时看到了个人化写作的积极意义和局限。

在谈及女作家的个人经验与女性写作的关系时，南帆和戴锦华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南帆认为“对于林白说来，记忆与躯体——个人与历史的两个部分——是她一系列重要小说的主要资源……现在遗留的问题是，这样的资源还能维持多久。不会再有第二部《一个人的战争》——事实上这部小说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清理仓库的感觉。相对于想像，记忆是有限的；相对于历史，躯体是有限的。已有的小说证明，林白是一个风格奇异的作家；那么，什么是林白未来的证明？”

65

戴锦华说“对于陈染和其它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为对象的作家来说，挑战来自于：离开自己的生命体验，写作的前景将如何展开？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可能仅仅重复自己。陈染的长篇《私人生活》，对她此前作品中的主题、母题、原型情境，作了一次总结。此后应该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私人生活》的结尾可以做象征的理解：那棵长得太大的盆栽植物，是不是应该移到户外？她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⁶⁶

4、在研究女性主义批评时，批评家持有不同的立场。徐坤认为在考察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文化立场”比“性别立场”更重要。“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女性主义，‘是以女性的独特体验，独特视点去反观男权文化’”。在她的阐述中，这两种立场其实是统一的。⁶⁷ 就如荒林和王光明的对话遵循的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二合一的标准。

王侃则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化批评之外，“同时还应该是一种美学批评，通过一种界定而凸现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写作基础与美学形态”。⁶⁸ 任一鸣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忽视了女性文本美学价值的研究，女性文学的美学批评处于弱势。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点共存为女性主义创造了健康的批评氛围。

应该看到，性别的差异是存在的，忽视了这一点，就失去了两性对话的可能。不过性别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通过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女性主义期待着更多的两性对话，期待着在两性的共同探讨中，加深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拓展女性主义的研究。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从来就不单是女性批评家的事，它的主体既包括那些有主体意识和理论思想的女性批评家，也包括那些自觉地以学术态度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的男性批评家。

对于文章开头引用的两位学者的观点：女性主义变成了女人自己的事，国内男性理论中心对女性主义反应淡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究其产生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直以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都作为弱者出现，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未能彻底改变。女性因此在潜意识和意识里，都不自觉地认为既然男女是不平等的，性别歧视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对于女性主义，男性自然是不会欣然接受或赞成的，更不用说关注了。因为女性主义是反对以男权为中心的，是为女性争取权益的，所以女性主义只能是女人自己的事，男性只会是惧怕或拒绝。因为如果男性一旦介入女性主义，他们的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受到威胁，男权统治就可能动摇。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和错觉导致了女性对男性和女性主义关系的误解。第二是出于对女性主义的不理解或曲解，确实有部分男性反对和抗拒女性主义。也许他们是被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侵蚀的男性，他们脑海里的男尊女卑思想依然牢固；也许他们的确误解了女性主义，简单地以为女性主义就是针对男性、反对或抨击男性的。基于这样一种原因，加上女性自身的偏见，一些学者以偏概全得出了上述结论。

可以这么说，任何领域如果只由单一性别的研究者支撑都是不健全的。在学科研究的领域，男女主体进行的研究应当是共存、互补的。肖沃尔特曾说过，“性别理论允许把男性主体介绍进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让男人作为学生、学者、理论家和批评家而进入女性主义批评领域”。⁶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抨击男权中心文化，但并不是说排斥男性个人或群体。在这个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只有女性孤军奋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男性学者、批评家的参与，才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没有陷入女性唱独角戏的困境。如果没有男性的积极响应，由女性唱独角戏不仅可悲，也不可行。性别既不可视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绊脚石，也不应成为通行证，如果这样只会削弱和缩减研究力量和研究队伍。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男性不仅完全可以从事女性主义批评和研究，而且他们的批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女性主义美学批评的研究方面，具有女性批评家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在男女主体都参与的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出自不同性别的对女性文本的不同感受，对丰富理解文本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性别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男性并未袖手旁观，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

深化、完善，女性主义批评需要更多的男性批评家加盟。

女性主义的研究还“在路上”，只有男女两性的共同关注，才能走得更远。

注释：

- ¹ 转引自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第11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² 周乐诗《跨越文化和性别的鸿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
- ³ 钟雪萍《后妇女解放与自我想像》，载《读书》2005年第11期。
- ⁴ 张首映著《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490、4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⁵ 孙绍先著《女性主义文学》，引言3-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 ⁶ 王干、费振钟《“男性”的声音》，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
- ⁷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与视野》，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 ⁸ 李有亮著《给男人命名》，代前言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 ⁹ 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¹⁰ 尹吕龙等《记忆与写作：我们时代的个人方式》，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 ¹¹ 陶东风《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载《花城》1997年第1期。
- ¹² 吴亮《私人写作的社会性》，载《文汇报》1997年5月8日。
- ¹³ 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 ¹⁴ 李洁非《“她们”的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 ¹⁵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 ¹⁶ 赵勇《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载《文艺评论》1996年第6期。
- ¹⁷ 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 ¹⁸ 陈骏涛《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载《山花》1999年第4期。
- ¹⁹ 荒煤《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载《批评家》1989年第4期。
- ²⁰ 孙绍先《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 ²¹ 孙绍先著《女性主义文学》，第16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 ²²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奇异景观》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3期。
- ²³ 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载《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
- ²⁴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
- ²⁵ 孟繁华《“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女性文学研究述评》，载《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 ²⁶ 陈骏涛《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几个问题及三代女批评家描述》，载《中国女性文化》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
- ²⁷ 易光《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载《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
- ²⁸ 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第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²⁹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35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 ³⁰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 ³¹ 赵勇《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载《文艺评论》1996年第6期。
- ³² 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 ³³ 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 ³⁴ 荒煤《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载《批评家》1989年第4期。
- ³⁵ 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绪论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³⁶ 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 ³⁷ 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 ³⁸ 李洁非《“她们”的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 ³⁹ 李玲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序，人民出版社，2002年。
- ⁴⁰ 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⁴¹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 ⁴² 同上。
- ⁴³ 转引自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⁴⁴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与视野》，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 ⁴⁵ 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 ⁴⁶ 荒林、王光明著《两性对话》，第14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 ⁴⁷ 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 ⁴⁸ 同上。
- ⁴⁹ 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年第1期。
- ⁵⁰ 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以后》，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 ⁵¹ 严平《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载《批评家》1989年第4期。
- ⁵² 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年第1期。
- ⁵³ 陈惠芬著《神话的窥破》，第240-24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⁵⁴ 《女性文学笔谈二十一家》，载《百花洲》2000年第4期。
- ⁵⁵ 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年第1期。
- ⁵⁶ 陶东风、林白《私人化写作与女性作家》，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5期。
- ⁵⁷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 ⁵⁸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载《当代作家评论》

2003年第6期。

- ⁵⁹ 荒林、王光明著《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 ⁶⁰ 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第161、174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
- ⁶¹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⁶² 徐坤著《双调夜行船》，第6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⁶³ 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 ⁶⁴ 任一鸣著《解构与建构》，第45、46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
- ⁶⁵ 南帆著《问题的挑战》，第21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 ⁶⁶ 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第82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
- ⁶⁷ 徐坤著《双调夜行船》，第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⁶⁸ 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 ⁶⁹ 伊莱恩·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 王逢振主编《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 1988
3. 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 1991
4. 张首映著《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 盛宁著《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6.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7. 胡经之主编、王岳川等副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 章国锋、王逢振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9. 陶东风著《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1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2. 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 5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3. 黄曼君主编《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14. 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15. 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6. 孙绍先著《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17. 康正果著《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8. 康正果著《风骚与艳情——中国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9.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0. 叶舒宪著《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1. 阎纯德主编《20 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22. 阎纯德著《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23. 王吉鹏等编著《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24. 乐铄著《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
25. 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体: 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女性主体的祭奠: 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6. 禹建湘著《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九州出版社 2004
27. 李有亮著《给男人命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8. 周海波、孙婧著《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9. 刘兵著《驻守边缘》青岛出版社 2000
30.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1. 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2. 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3. 林丹娅著《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34. 陈顺馨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5. 徐坤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6. 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37. 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95
 38. 任一鸣著《解构与建构——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九州出版社 2004
 39. 荒林、王光明著《两性对话——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40. [法]波伏娃著《第二性》陶铁柱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41. [美]凯特·米利特著《性的政治》钟良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42. [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林树明、陈彩霞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43. [挪威]陶丽·莫依著《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赵拓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44. A Room of One's Own, Virginia Woolf, Granada, London Toronto Sydney New York, 1977
 45. 王逢振《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载《外国文学动态》1986 年第 3 期、《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 年第 5 期
 46. 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载《文学评论》1988 年第 1 期
 47. 林树明《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载《上海文论》1989 年第 2 期、《抗拒的阅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载《上海文论》1991 年第 5 期
 48. 王宁《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 5 期
 49. 孙绍先《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 年第 4 期
 50. 荒煤《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载《批评家》1989 年第 4 期
 51. 孟繁华《“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女性文学研究述评》载《艺术广角》1990 年第 3 期
 52. 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载《文学评论》1990 年第 4 期、《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载《上海文论》1992 年第 4 期
 53. 阎纯德《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奇异景观》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 年第 3 期
 54. 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载《文艺争鸣》1996 年第 4 期
 55. 陶东风《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载《花城》1997 年第 1 期
 56. 李洁非《“她们”的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 年第 5 期
 57.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载《文学评论》1998 年第 6 期、《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3 期
 58. 陈骏涛《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几个问题及三代女批评家描述》载《中国女性文化》第 3 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年、《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载《山花》1999 年第 4 期
 59.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 年第 3 期

-
60. 赵勇《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载《文艺评论》1996年第6期
61. 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62. 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以后》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63. 尹吕龙等《记忆与写作：我们时代的个人方式》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64. 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年第1期
65. 陶东风、林白《私人化写作与女性作家》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5期
66.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67. 钟雪萍《后妇女解放与自我想像》载《读书》2005年第11期
68. 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69.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后 记

论文终于完成了。想起写作期间的点点滴滴，不禁感慨颇深。个中的辛苦自不必说，当然更多的是收获，收获了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

首先我要感谢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亲情和友情伴我度过了论文写作的日日夜夜。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方克强教授。这篇论文的完成，离不开一直以来方老师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和精神上的鼓励。他主张做学问要有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主张人文知识分子要关注现实。从开题到写作到修改，老师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论文写作的关注和指导，并一再提出有益的建议，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一个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人才可能做出扎扎实实的学问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我和同学们，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学习、生活、工作以及人生中的思考都非常有帮助。在这里，我要衷心地充满敬意地对老师说：谢谢你，方老师！

同时我要感谢华师大，使我有机会走过我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段旅程。忘不了华师校园的宁静和热闹，忘不了丽娃河畔的驻足和散步。每每想起在华师生活的种种，心中便涌起深深的不舍，期盼着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写于 2006 年 9 月